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639-02

西南联大的精神遗泽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读后感

赵 林

不久前,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3月)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分别出版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记载了一位百岁老人充满坎坷的求学历程和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该书的口述者刘绪贻教授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蜚名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刘先生早年曾在西南联大受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大师的影响而步入社会学领域,后来又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和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等人继续深造,并由社会学进路转而研究美国社会历史,尤其是罗斯福时代以来的美国现代史。2002年,刘绪贻教授与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巨著《美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至今仍被奉为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现今已是98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仍然思维敏锐,每日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地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撰文对各种社会时弊和学术腐败现象进行无情的针砭批判。刘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思想上始终保持“宝刀不老”的状态,与他早年的求学治学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部口述自传(上卷)不仅展现了一位胸怀报国之志的好学青年在旧社会环境中追求知识的坎坷历程,而且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对童年梦幻、青春情怀、联大旧事和异国风情进行了富于启发性的反思。

《箫声剑影》陈述了从1913年刘绪贻先生出生一直到1947年留美归国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2)清华、联大的大学生涯;(3)大洋彼岸的留学经历,其中尤其是清华、联大的大学生涯对于先生日后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道路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二是刚直不阿的社会正义感。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残败局面,为了保存和发扬中华文明的火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经湖南长沙辗转南迁至昆明,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在8年时间里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华民族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毕业生,这些人后来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刘绪贻先生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曾亲身聆受了许多学术大师的思想恩泽。他在《箫声剑影》中把西南联大在教育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总结为五点,即爱国、民主、科学、艰苦、团结。

就爱国而言,西南联大创办于国难当头之际,全体师生无论贫富贵贱均胸怀救亡图存、雪耻复兴的民族大志。西南联大的校歌中写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悲愤激昂的校歌表达了联大师生同仇敌忾、发奋自强的的心声,也不断激发起同学们刻苦学习、为国效命的决心和意志。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在勤奋读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不少人投笔从戎,直接加入到抗击日寇的战斗行列中,甚至马革裹尸、以身殉国。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敝陋校园中,始终洋溢着燕赵悲歌慷慨之气,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联大学子发扬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勤奋求学以报效祖国。

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刘先生在书中充满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在校务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在校务委员会之外,还设有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学校的一应大事,如审议教学、科研和学风的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和学位的授予,向校务委员会提交改革建议等,均由教授委员会负责,其决议具有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刘先生讲述道:“西南联大既无党派领导,也没有官本位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精神,学校能自主办学。对学生管理,除学籍管理和学业管理极严外,主要采取学生自治方针。……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教书读书。”正是这种民主精神,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师们能够各

尽其才,学生们则可以自主学习,从而使得大量杰出人才从极其简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西南联大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尊重学术和尊重真理,在学术和真理的权威面前,富贵、资历和权位都一文不值。在西南联大,人们只对学问表示钦佩,大多数人都对做官不屑一顾。刘先生回忆说,蒋梦麟虽然当过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但是他在学生心中的威望远远不及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梅贻琦不得已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但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完全是形同虚设。……他深信强权和说教是极有害于科学事业的,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支持和拥护他的这种信念。”联想到今天中国大学界盛行的行政化倾向,一些大学的行政管理者一旦官运亨通,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当上教授、博导,获得大量经费和奖项,甚至成为知名学者,学术和真理已经在权势面前斯文扫地。长此以往,中国大学的科学精神将逐渐萎缩,喊得震天价响的“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也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自慰。看来西南联大的科学精神在当今中国教育界真应该好好地加以发扬了!

至于艰苦和团结这两个方面,更是令人感动。“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徙至滇,当时的280名同学和11名教师,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从长沙徒步行至昆明,历时68天,步行达1300公里。西南联大建立之后,缺少教学设施和研究手段,师生们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保障。刘先生回忆道,梅贻琦校长家里由于吃不起蔬菜,只能用辣椒拌饭,其夫人经常要摆地摊卖织品以补贴家用。一校之长尚且如此,一般师生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患难与共、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把西南联大办成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据《箫声剑影》记载,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在整整8年时间里,入校受教者达8000余人,毕业生3725人。这些人后来或者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股肱,或者成为海外学术界的鸿儒巨擘。在1955—1957年间选出的190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有118人是西南联大校友,占总数的62%以上;而那些到海外继续深造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人才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气象学家叶笃正,我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著名作家汪曾祺和诗人穆旦,以及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和历史学家何炳棣等等。

除了总结西南联大硕果丰盈的五大原因之外,刘绪贻先生在自传中还极其生动地展现了西南联大一些著名学者的人格风采。如陈达教授从谏如流的开阔胸襟,潘光旦教授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和豁达风趣的人生态度,吴文藻教授潜心治学和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气,费孝通教授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此外还有学问超群而性情浪漫的吴宓教授,思想深邃而立场保守的冯友兰教授,以及叶公超、贺麟、柳无忌、李景汉、陈序经诸公,他们在刘绪贻先生的追忆中个个鲜活生动、恍若再世。尤其是对于师母冰心(吴文藻教授之妻)的描述,清新优雅的文笔使冰心先生的高洁品性跃然纸上:

我因青少年时读过冰心先生优美的诗歌、散文,阅览过一些有关她的文字,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传说,常想象其为人。可能是第一次到她家,在她书房的窗台上看到一个花瓶,既不名贵,也不华丽,不过是竹木为料的手工作品,但小巧玲珑,很是雅致。瓶之一侧,有一行清秀的小字: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冰心先生此时年约三十八九,体态清瘦,淡装素裹,清标照人,活脱出一幅文学书籍插图中李清照画像。面临这新木煨香别墅、这绮窗、这雅致花瓶,这“西风人瘦”题词,联想到易安居士词与文中跃动着的高雅生活情趣,使我铭刻在心,至今如在目前。

而刘先生这段淡墨轻彩的描述,也同样使冰心先生高雅清纯的音容风貌蓦然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数月前,我的博士生导师、年逾八旬的杨祖陶教授的追忆之作《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即将付梓,有感于恩师高山仰止的人品文章,我曾写了《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一文。而今我的硕士生导师、年近百岁的刘绪贻教授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欣然问世,读后不禁心潮如涌,深为先生当年的孜孜求学情和拳拳爱国心所感动。刘绪贻先生与杨祖陶先生,二人无论是人生阅历、学术方向、情趣志向和性格脾气都相去甚远,杨先生性情温良、淡泊超脱;刘先生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然而,尽管性情迥异,在他们二人身上却同样表现出视学术为生命、视正义为神圣的崇高德行。这种一致性绝非偶然,我想似应与他们都曾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有关^①。这种源自西南联大的崇高圣洁的学术境界和人格精神虽然历经磨难,却不绝如缕,它正是我辈在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境遇中应该发扬光大者。

注 释:

① 刘绪贻先生是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首批学生,而杨祖陶先生则是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末代学生。